

辯機的西域記

高田時雄*

摘要：

在唐人著作中，存在不見於現行本《大唐西域記》的闕文。范祥雍曾就此撰文，推定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在唐代存在過兩種本子：一為貞觀二十年(646)七月由玄奘進呈太宗的文本，一為高宗顯慶元年(656)于志寧等奉敕修訂的文本。然而，顯慶元年對《大唐西域記》的修訂，不可能是范氏所推想的大規模修訂。且上述所有闕文，均來自道宣、玄應等參加過玄奘譯場的僧人之著作，筆者據此論定，所謂闕文的來源應是辯機所撰稿本。至於顯慶元年修訂的具體情況，筆者通過將日本古寫本與現行藏經本進行比較，以冀窺見其中一二。

關鍵詞：《大唐西域記》、玄奘、辯機、日本古寫本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Bianji's Version of the *Datang Xiyuji*

Takata, Tokio *

ABSTRACT:

Fan Xiangyong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Hsuanchuang's *Datang Xiyuji* (*Western Regions' Records during the Great Tang Dynasty*). He hypothesizes that one was the text that Hsuanchuang officially presented to Emperor Taizong in July of the 20th year of Zhenguan (646) and that the other was an amended edition, written under Emperor Gaozong's order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Xianqing (656). He suggests that missing *Datang Xiyuji* texts are often discovered among T'ang-period works and these texts are those of Hsuanchuang's official text. Nevertheless, the amendments of the first year of Xianqing could not have been on such a large scale as Fan imagin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 missing texts are a part of the manuscript executed by Bianji; the amendments done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Xianqing were merely a simple embellishment of the text. The evidence for this theory is the fact that these missing texts appear only in the works of monks such as Daoxuan and Xuanying, who participated in Hsuanchuang's workshops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As for the actual contents of the amended version writte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Xianq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e can learn something through comparing the text of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with existing editions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Keywords: *Datang Xiyuji* (*Western Regions' Records during the Great Tang Dynasty*), Hsuanchuang, Bianji, Japanese Old Manuscripts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一、前言

一九八二年，范祥雍發表了題為〈《大唐西域記》闕文考辨〉的論文，¹根據唐代幾種著作中存在不見於現行的《大唐西域記》的闕文的事實，論述了唐代曾經存在「最初本」與「修訂本」兩種文本。並提出假說，認為最初本是貞觀二十年（646）七月呈給太宗的文本，後者的修訂本則是高宗顯慶元年（656）于志寧等奉命進行修訂的文本。

顯慶元年高宗所下的命令見於《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八，記載如下。

（顯慶元年）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安縣開國公崔殷禮宣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子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

就是說關於玄奘的新譯經論，認為「翻譯的經論既然是新翻譯的，那麼其文義就應明確」，並說「在閱讀以後，如有不穩便之處，即須一一潤色」。范氏認為奉此命令修訂而成的就是現行本，而見於唐代幾種書籍的闕文則是修訂以前的最初本，即呈給太宗之本。筆者認為，范氏根據闕文的存在而主張存在前後兩種文本之說是非常重要的提議，但不贊成

¹ 范祥雍，〈《大唐西域記》闕文考辨〉，《文史》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73-87。

將修訂本推定為顯慶元年本的意見。小文承認兩種文本的存在，而推測現行本纔是貞觀二十年的進呈本，今日仍然散見於幾種著作的闕文則應是辯機早前的稿本中的文字。

二、關於闕文的探討

范氏論文在闕文以外並提出存疑與訂訛的部分進行論述，現在除去這些內容，謹就確屬闕文的部分而言，共有二十三條。保存了闕文的著作是道宣的《釋迦方志》及《續高僧傳》、道世的《法苑珠林》，還有慧琳的《一切經音義》。今限於篇幅，無法盡數列舉這些闕文，希望讀者參看范氏論文，此處僅就這些闕文談幾個問題。

二十三條闕文中有十七條均見於《釋迦方志》。與此十七條的文句相同或對應之處亦見於《釋迦方志》以外的著作，范氏將其作為參考進行列舉。《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自《西域傳》的文句（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第十四條）以及卷二十九²引自《奘法師傳》（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的文句就屬此類。順便提一下，第四條除了《法苑珠林》以外，《華嚴經疏鈔》的「摩度羅者，亦同摩偷羅，此云孔雀，亦云密蓋」亦加以引用，原書雖云「具如《西域記》第四說」，但大概是引自慧苑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³

在道宣的著作中，還有《續高僧傳》亦可見到闕文，但集中出現在

² 范氏誤為卷三十九。

³ 見於[唐]慧苑的《音義》卷中，收於[清]伍崇曜彙編，《粵雅堂叢書》本卷二（台北：中文出版社，1983年），第4頁表面。《華嚴經疏鈔》的著者澄觀（738-839）與慧琳（737-820）是同時代人，有可能看過慧琳《一切經音義》，但《華嚴經疏鈔》既然是《華嚴經》的注釋，援用慧苑《音義》的可能性更大。又眾所周知，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所收的《新譯華嚴經音義》是套用慧苑《音義》的，但其卷二十二所採錄的正文，「孔雀」誤作「三雀」。

卷四《奘法師傳》中（第六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不過這三條亦均見於《釋迦方志》。

范氏所舉闕文中的其餘六條皆見於慧琳《一切經音義》。范氏是從慧琳書中引用的，但慧琳在撰寫《音義》一百卷時，儘可能利用了先有的玄應、慧苑的音義，闕文的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均見於玄應書中。⁴看來范氏本應根據玄應書進行列舉。不過，關於最後的第二十三條，需要稍加檢討。范氏所舉之處如下。

（旃荼羅）其人若行則搖鈴自標，或柱破頭之竹。若不然，王即與其罪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三引，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引同）

（旃荼羅）屠膾主殺，守獄之人也。彼國常法，制勒此類：行則闕於路左，執持破竹，或復搖鈴打擊為聲，標顯自身，恐誤觸突淨行之人。若不如此，國有嚴刑，王則治罰此人，彰淨穢有異。

（慧琳《一切經音義》一引）

該條的出處無誤，兩段闕文中，前者據玄應書的卷三（希麟大概是轉引了玄應書），後者為慧琳書的卷一所引用。兩者均為見於《西域記》卷三的呾叉始羅國的「旃荼羅」的音義，解釋的是同一詞語，但兩者文字卻很不相同。慧琳書的第一卷當然是有關《大般若》的音義，但玄應的音義缺了《大般若》，⁵所以慧琳只能親自撰寫音義，卷首也標示「慧琳

⁴ 范氏認為第二十二條「鷲」字的音義「色蒼黃目赤也」是「希麟《續一切經音義》二十七引」，這顯然是「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七引」之誤。希麟的《續音義》共十卷，根本不存在卷二十七。

⁵ 《大般若》六百卷是玄奘晚年於顯慶五年（660）正月一日開始翻譯，龍朔三年（663）十月二十三日完成。[日本]永超《東域傳燈目錄》著錄了玄應的《大般若經音義》三卷（《大正藏》冊 55，頁 1148 上欄），所以看來玄應隨著翻譯

音」。⁶因此關於第二十三條中第二段闕文，只能認為並非玄應而是慧琳獨自引用了《西域記》。關於這一點，下文還要另作探討。

唐代的其他著作也引用了《西域記》。例如玄奘的弟子中最突出的大乘基（632-682）的《大乘法苑義林章》與《妙法蓮華經玄贊》、天台六祖湛然（711-782）的《法華文句記》、《止觀輔行傳弘決》、華嚴宗的澄觀（738-83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等也引用了《西域記》，但均不出現行本的範圍。

三、聚集於弘福寺譯場的諸人

貞觀十九年（645）三月，在洛陽見過太宗回到長安後，玄奘住在弘福寺開始譯經。負責留守長安的司空房玄齡為玄奘主持了譯場的準備工作，幫助玄奘的大德們就這樣從各地被召集而來。夏六月，作為證義大德，精通大小乘的經論而為同輩推舉的僧人——弘福寺沙門靈潤以下的十二人來到譯場，此外尚有九位綴文大德就任。在綴文大德中可見會昌寺沙門辯機與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之名。而且作為僅有一人的字學大德，大總持寺沙門玄應也來參加。⁷

上文談到的闕文，主要是道宣的《釋迦方志》及《續高僧傳》、還有玄應的《眾經音義》所引用的。與此基本相同的闕文亦見於道世《法苑珠林》、慧琳《一切經音義》，但考慮到成書年代，將其看作是從先有的道宣、玄應的著作間接引用的想法並非不可能。道世與慧琳後來在西

的進展而撰寫了音義，但未及完成就逝世了，結果未被合併至其《眾經音義》二十五卷之中。

⁶ 慧琳援引玄應書時，在各卷目錄的經題下明確記載「玄應」是一個體例。

⁷ 以上均據[唐]慧立、彥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1。

明寺活動，需要考慮他們著作的背後有西明寺藏書的存在。

無論道宣還是玄應，他們都是貞觀十九年玄奘開設譯場時最早趕去參加的大德。而代玄奘從事《西域記》草稿撰述的，正是譯場同事的辯機。這僅僅是偶然嗎？

不過道宣在譯場僅有一年左右，在《西域記》成書後進獻給太宗的貞觀二十年（646）七月十三日，似已告別譯場回到終南山了。⁸但道宣在譯場的一年，正是辯機寫成《西域記》的草稿、玄奘加以潤色的時期。道宣到手的《西域記》很可能不是已經完成的進呈本，而是辯機的稿本。辯機的稿本想必帶有以玄奘的刪改為前提的長編的性質，內容比進呈本更豐富。

字學大德的玄應也是一開始就在譯場，應該與辯機密切往來。而且與道宣不同，玄應在貞觀二十二年（648）十二月譯場移至新建的大慈恩寺以後仍長期留在譯場，似於龍朔元年（663），最晚可至龍朔二三年前後示寂。⁹因此玄應應該見到辯機與高陽公主的關係暴露後，貞觀二十二年（648）辯機被腰斬的事件。玄應等譯場的同輩與辯機的關係一定是多種多樣的，但想來有不少人同情辯機年紀輕輕卻不得善終。《西域記》卷末至今仍附有辯機的贊，儘管文中出現辯機之名，卻未被刪除而得到保留，可以認為這是因為至少辯機撰述《西域記》的貢獻獲得很高的評價。而玄應也應持有辯機的稿本。

道世的生年及示寂之年不明，但與道宣是同於隋大業十一年（615）

⁸ 藤善真澄，《道宣傳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頁141-142。

⁹ 神田喜一郎，《緇流の二大小學家》，《支那學》第7卷第1號（1933年）。後收入神田喜一郎，《東洋學說林》（京都：弘文堂，1948年）。今據《神田喜一郎全集》第1卷（京都：同朋舍，1986年）所收版本，頁196。

由弘福寺的智首和尚受具足戒的同門，顯慶年中也參加了玄奘的譯場，西明寺建成後，以其英博被招至該寺居住。¹⁰當時擔任西明寺上座的是其師兄道宣。道世的著作《法苑珠林》一百卷於總章元年（668）在該寺完成。¹¹道世很可能接觸過辯機的稿本。

此外，慧琳是疏勒（Kashgar）人，住西明寺。其《一切經音義》是在元和十二年（817）二月三十日於該寺完成的。¹²西明寺本是太宗第四子濮王李泰的府邸，死後沒入官府，顯慶元年（656）八月為祈願皇太子李弘的病癒而勅建，三年（658）完工。這個新寺院的上座是道宣，寺首是神察，都維那是智衍、子立。他們幾乎全是玄奘譯場的參加者，在用人方面令人聯想到玄奘巨大的影響力。如果該寺的經藏中除了進呈本《西域記》以外，尚有辯機的初稿本《西域記》，這也並非不可思議之事。慧琳可能見過該本。

四、顯慶元年修訂的性質

如上所述，范祥雍對顯慶元年奉高宗之命改寫以前的文本與此後的文本加以區別，以前者為最初本，後者為修訂本。他認為最初本是貞觀二十年進呈給太宗之本，以傳承至今的文本的系統為修訂本。唐代文獻中可以見到「闕文」，是因為這些屬於修訂前的文本，這是范氏的見解。

¹⁰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第四「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大正藏》冊 50，頁 726 下欄。並參看[日本]慧堅，《律苑僧寶傳》卷五「唐京兆西明寺玄暉世律師傳」，收入佛書刊行會編印，《大日本佛教全書》冊 105（東京：佛書刊行會，1915 年），頁 52-53。

¹¹ 據[唐]道世，《法苑珠林》卷首所附李儼的序，《大正藏》冊 53，頁 269 上-中欄。

¹² 景審的序中有「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¹²[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大正藏》冊 54，頁 312 上欄。

然而爲了肯定此說，看來有必要對顯慶元年修訂的性質試作檢討。《大唐西域記》的正文是否受到這種大幅度的修訂呢？高宗的命令只是說新譯經論的字句「如有不穩便之處，須加潤色」，不過是要求在表達方式上的改寫。而且僅就經論而言，至於是否涉及《西域記》之類的書籍則有疑問。在此時進行現在所見的刪定「闕文」的大幅度改編終究是無法想像的。

那麼顯慶元年的修訂是否與《西域記》完全無關呢？筆者認爲應該還是利用這個機會作了某些更改。然而從性質上看修訂的規模不足以產生這些「闕文」，無疑僅限於極小的規模。

關於這個問題，試比較日本古寫本《西域記》的文本與高麗藏等後世的大藏經所收的文本，可以觀察非常耐人尋味的結果。《西域記》常常出現的「聞諸先志」的文句，在日本古寫本是寫成「聞諸土俗（聞之土俗）」或「聞諸耆舊（聞之耆舊）」兩種形式的。就是說可以認爲，日本古寫本，更準確地說應是日本古寫本的底本中的「聞諸土俗（聞之土俗）」或「聞諸耆舊（聞之耆舊）」的文句，大概被有組織地改爲「聞諸先志」，而不可能是相反的情形。因爲如係將「聞諸先志」改爲「聞諸土俗」與「聞諸耆舊」，那麼哪些改爲「土俗」、哪些改爲「耆舊」就需要有某種標準，然而無法認爲竟有這種標準。順便談一下，應該注意的是同樣的對應關係也見於敦煌寫本的《西域記》。英藏《西域記》卷一寫本（S.2659）的文本是與日本古寫本完全一致的。¹³因此日本古寫本的文本顯然不是在日本所作的獨特更改，而是來源於唐代的古本。

¹³ 敦煌寫本中的《西域記》尚有 P.3814（卷二斷簡）、S.958（卷三斷簡），但這些文本與通行本並無不同。因此顯慶元年修訂以前的文本與修訂後的文本兩者均已傳到敦煌。

正如卷末的「論贊」所指出的，《西域記》是辯機根據玄奘的「志記」寫成的。這些是玄奘摘取自己旅行途中的日記與印度語的原著以供參考的資料。無論如何，其所根據的文獻是存在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相較於「聞諸土俗」與「聞諸耆舊」，寫作「聞諸先志」是合理的。再者，藏經本四次引用了「印度記」，而在日本古寫本中有兩次作「先賢記」。這也是統一了日本古寫本的原本中的不一致之處，這樣理解應該比較自然。總之，可以認為現在所見的藏經本的《西域記》文本是顯慶元年「潤色」的結果。顯慶元年的修訂應該是這種程度的更改，而不是范祥雍氏所設想的大規模修訂。

五、日本古寫本的由來

雖說是日本古寫本《大唐西域記》，實際上並非單行的寫本，而是被編入日本自古相傳的寫本大藏經的《西域記》。現在單獨收藏的這些寫本，以前也是某個寺院藏經的一部分。收有《西域記》的日本古寫大藏經，由於近年調查的進展，已有相當的數量。筆者所能利用的《西域記》古寫本中，京都興聖寺的卷第一（延曆四年，785年）最早，其次是現在歸於御茶之水圖書館的德富蘇峰的成實堂文庫本卷十（長曆五年，1041年）、守屋孝藏舊藏的現為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卷一（康和四年，1102年）。全十二卷中缺了卷二與卷十的有法隆寺收藏的大治元年（1126）書寫的《西域記》，卷二在明治時期流出，經京都神田氏收藏，現為大谷大學所藏。石山寺一切經的《西域記》十二卷完整，卷一至卷八為長寬三年（1163）書寫的，保留了古本的面貌。河內的金剛寺本缺卷一與卷十，但有保延五年（1139）書寫的紀年。名古屋的七寺一切經本的《西域記》存卷一至卷三、卷五至卷八共七卷，是治承二年（1179）的寫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松本文三郎舊藏的西域記，

十二卷完整，可以認為原是飛鳥的橘寺的什物，鎌倉以降移至東大寺。此本無紀年，大概是鎌倉時代、十三世紀初葉的寫本。更有十二世紀由奧州藤原氏進獻的中尊寺金銀泥字藏經《西域記》十二卷，現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此外，京都的醍醐寺有建保二年（1214）加點的卷十一與卷十二。¹⁴可以認為這些日本古寫《西域記》都保留了唐代的古本，與刊本大藏經本略有不同，上文所述可見一斑。

那麼日本古寫本《西域記》何以傳承了古代文本呢？在遷都於奈良的平城京之前，飛鳥時代的白雉四年（653），有位名叫道昭（629-700）的僧人隨遣唐使入唐。道昭學於玄奘，據說玄奘很器重道昭，讓他住在同一所房舍，回國時玄奘將舍利經論全部傳給他。¹⁵其中是否包含了《西域記》雖無明文記載，看來很有可能。其後，玄昉於天平七年（735）將經論五千餘卷帶到日本，一般認為《開元釋教錄》所收的藏經共五千四十八卷由此全部傳入日本，因此這時《西域記》應已帶到日本。另一方面，正倉院文書中可見天平十一年（739）書寫《大唐西域記》的記載。該寫經記錄缺了卷二、五、八、十一共四卷，其他八卷則有使用紙

¹⁴ 此處所舉日本古寫本的大部分尚未公開於世。但中尊寺金銀泥字藏經本的全部圖版已見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古寫經篇）》（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1年）。醍醐寺本見於：築島裕，〈醍醐寺寶藏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建保點〉，《研究紀要》第11號（京都：醍醐寺文化財研究所，1991年）；築島裕，〈醍醐寺寶藏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建保點〉，《研究紀要》第12號（京都：醍醐寺文化財研究所，1992年）。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寫本，已經公開於該所網站（<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

¹⁵ 《續日本紀》文武天皇四年（700）三月己未條所置的道昭的卒傳。見菅野真道等，《續日本紀》前篇，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年），頁5-6。

張的記載，¹⁶本身共有 181 張。據《開元錄》，《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的用紙為 234 紙，天平十一年的寫經 8 卷共有 181 張，單純算來全書應有 241 卷。關於佛經的書寫，一紙的行數以至一行的字數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因此天平十一年書寫的底本不同於玄昉新帶來的文本，很可能使用了道昭以來的古本。如是，則道昭直接受於玄奘的文本保持了顯慶元年修訂以前的文本的面貌也不足為奇。

六、關於辯機稿本傳承範圍之謎

我們回頭來看辯機的稿本問題。貞觀二十年七月的進呈本是《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的定本，是最權威的文本，這一點不容置疑。但該進呈本的基礎是辯機執筆的稿本。玄奘三藏在貞觀二十年以後，急於將《西域記》獻給太宗，想必稍微減少譯經的工作，對辯機寫成的草稿進行潤色。這個時期的譯經較以前為少可以證實這一點。¹⁷那麼定本完成以後，辯機的稿本下落如何呢？是否因為用過以後就廢棄了呢？草稿事先考慮到玄奘的刪定工作，應有更加豐富的內容，具有獨特的參考價值。有足夠的理由設想這個稿本在譯場的同事之間傳閱、傳抄。如上所述，道宣在此前後離開了譯場，他見到的《西域記》並非進呈本，而恰恰就是辯機稿本的概率很高。正因為如此，道宣的著作《釋迦方志》與《續高僧傳》引用的《西域記》的文章中出現了與現行本不一致的「闕文」。

像玄應這樣長期留在譯場的僧侶，應有更多機會接觸稿本。即使玄應的《眾經音義》所引的《西域記》與道宣的著作一樣使用了稿本也並

¹⁶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第 7 冊（東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1952 年），頁 335。

¹⁷ 藤善真澄，《道宣傳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 年），頁 141-142。

非不可思議。

而《新唐書·藝文志》在著錄「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姓陳氏，緜氏人」的同時也著錄了「辯機西域記十二卷」。¹⁸此處想必是出於疏漏的失誤，即使如此，使用「辯機的西域記」這一稱法也是值得注意的。由此可知，雖然無法想像稿本會長期存於世間，但作為稿本作者的辯機之名卻廣泛留存於人們記憶之中。

那麼辯機的稿本能否越過譯場一部分有關人員的局限而流傳呢？這個問題與第一節提到的范氏闕文的第二十三條有關。即關於「旃荼羅」的音義被引用的《西域記》的闕文中，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所引部分與玄應《眾經音義》卷三所引部分，在文本上有相當大的不同。玄應的「闕文」是根據稿本的看法沒有問題，但慧琳所引《西域記》的文本竟比玄應所引的更加詳細又是為何呢？

慧琳在其《一切經音義》卷第八十二中撰了有關《大唐西域記》的音義，逐一檢查作為音義對象詞語後會發現，這些均不出現行本的範圍。即慧琳作《西域記》音義時，其底本並非稿本，而是與現行本系統相同的文本，大概是西明寺的藏經本。然而慧琳在其《音義》卷一撰寫見於《大般若》的「旃荼羅」的音義引用《西域記》時，其文本未必就是作為西明寺藏經一部分的《西域記》，因此無法否定其為西明寺藏經中另收的辯機稿本的可能性。西明寺創建時的上座是道宣，可以認為是道宣將辯機稿本帶到西明寺的。而慧琳必定利用了這個文本。

即使如此，仍然未能解決玄應所引《西域記》的闕文與慧琳所引闕文不同的問題。如果兩者均引自辯機的稿本，那麼應該不會出現這種不

¹⁸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頁1528。

一致的情形。或許辯機的稿本有幾種不同的文本，玄應持有的文本與慧琳所用的文本（亦即道宣所傳之本）本來就有若干差異。辯機在編纂《西域記》過程中，進行了幾次改寫，因此也無法否定存在幾種不同的草稿的可能性。如此假定，那麼說明玄應與慧琳的文本不同的原因並非不可能。但這不出想像的範圍，兩者文本的不同仍是一個謎。

七、結語

小文受到范祥雍關於《大唐西域記》存在兩種文本這一假說啓發頗多。但范氏將這兩種文本聯繫到顯慶元年的修訂問題恐怕是個誤解，顯慶元年的修訂不過是見於日本古寫本與通行本之間的局部改編。另一方面，道宣與玄應等人著作中引用的《西域記》存在不見於通行本的「闕文」，可以認為是由於用了辯機的稿本。他們都是在玄奘的譯場工作的同事。

參考書目

一、藏經

[宋]贊寧，《宋高僧傳》，《大正藏》冊 50。

[唐]道世，《法苑珠林》，《大正藏》冊 53。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大正藏》冊 54。

[日本]永超，《東域傳燈目錄》，《大正藏》冊 55。

二、古籍

- [唐]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唐]慧苑，《音義》卷中，收入[清]伍崇曜彙編，《粵雅堂叢書》本卷二，台北：中文出版社，1983年。
- [北宋]歐陽修、宋祁等合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
- [日本]慧堅，《律苑僧寶傳》，收入佛書刊行會編印，《大日本佛教全書》冊105，東京：佛書刊行會，1915年。
- [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第7冊，東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1952年。

三、專書

-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古寫經篇）》，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1年。
- 神田喜一郎，《東洋學說林》，京都：弘文堂，1948年。
- 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京都：同朋舍，1986年。
- 神田喜一郎，《緇流の二大小學家》，《支那學》第7卷第1號，1933年。
- 菅野真道等編，《續日本紀》前篇，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76年。
- 藤善眞澄，《道宣傳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

四、論文

- 范祥雍，〈《大唐西域記》闕文考辨〉，《文史》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築島裕，〈醍醐寺寶藏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建保點〉，《研究紀要》第11

號，京都：醍醐寺文化財研究所，1991 年。

築島裕，〈醍醐寺寶藏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建保點〉，《研究紀要》第 12

號，京都：醍醐寺文化財研究所，1992 年。

五、網站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網站，<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

（責任編輯：釋心皓）